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及其反思

刘冠启, 花家涛

(安徽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探究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问题, 需在跨学科视角下, 从学科概念、方法与范式出发, 反思其方法论的局限性, 继而阐明史学思维对推动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变革的重要意义。研究认为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提供重新认知体育研究对象的方法, 拓展勾连体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视野, 更迭体育文化行为解释的研究范式, 提供以微观体育管窥社会结构变迁的叙事方法。以上述方法论为指引开展体育人类学研究, 形成田野经验在历史上的延续性, 不仅在空间维度上深化对微观体育行为的文化叙事, 而且在时间维度上强化体育文化的历史过程叙事, 继而为体育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推进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体系化发展。

关键词: 体育人类学; 体育史; 史学转向; 方法论变革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5-0022-07

The historical turn of research on the sports anthropology and its reflections

LIU Guanqi, HUA Jia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turn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sports anthrop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ethodology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rom the concept, method and paradigm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n the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thinking in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sports anthropology.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historical tur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ports anthropology provides a method to re-recognize the object of sports research, expanding the research vision of linking sports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chang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ports cultural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and providing a narrative metho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micro sports.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bove methodology forms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field experience, not only deepens the cultural narration of micro sports behavior in spatial dimension,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narration of sports culture in time dimension, and then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the overall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and promotes the loc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sports anthropology; sport history; historical turn; methodology change

在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探究基础上, 体育人类学研究始终遵循村落或社区体育个案深描的问题展开。然而, 如何从田野个案的深描中理解蕴含的宏观社会知识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和难点。对此, 渠敬东^[1]认为, 个案背后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呈现, 关键是个案的时空延展性与丰富的历史印记。中国人类学以往主要以村落或社区为研究对象, 以民族志为研究文本, 以类型

化结论与整体性社会图景呈现为研究动向, 强调“场域空间内外关系及历史的前后相续”^[2], 构成中国人类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进路。但体育人类学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共时性的地方性体育知识深描, 还要关注体育现实经验的历史生成过程, 试图实现以体育为微观窗口管窥社会结构变迁目的。对此, 探寻“为何”与“何以”实现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问题, 既

收稿日期: 2024-02-10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3AH040018)。

作者简介: 刘冠启(1995-),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人类学。E-mail: 1181553498@qq.com 通信作者: 花家涛

是中国体育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新时期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学术自觉的应尽之责。

1 文献回顾及问题聚焦

回顾既往经典体育人类学研究,格尔茨^[3]通过对深层游戏斗鸡的深描,阐释了斗鸡的戏剧化过程、文化隐喻及其社会场景;雷蒙德·弗思^[4]则探讨了体育竞赛与所处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均将体育置于前文化的历史情境下予以考虑,透过体育投射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1990年日本体育人类学者寒川恒夫被邀至原上海体育学院讲学^[5];1999年胡小明先生的第1本《体育人类学》专著问世^[6];谭广鑫^[7]基于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展开对“武舞巫文化复合体”的深描。将体育实践置于发生的历史场景中予以认知与考察,推进体育人类学研究逐步走向历史纵深。但国内体育人类学研究多聚焦于民族传统体育人类学化探索,注重体育的共时性分析,对体育呈现的现实问题和释今寻古的历史经验性反思有待推进。

首先,在研究核心议题上,大多数体育人类学研究遵循民族传统体育的人类学化主线,深入阐释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失范”^[8]“身体表达”^[9]等问题,丰富了体育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但从人类学整体性思维反观体育人类学研究,相对缺乏历史关照,如何引入史学视角,采用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互证的双重思路,以释今寻古的方法反思当前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论显得十分必要。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村落、仪式体育等微观个案研究,而秉持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思维,将体育置于所处区域社会历史动态进程中较为鲜见,学者在方法学上形成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文本呈现为主,而缺乏与之处所处的历史文化动态进程中予以寻绎考证,其根本在于忽略“人类学与历史学二者存在互补性”^[10],另一方面,对于体育所透视“历史事实”背后的“社会事实”缺乏有效挖掘,阻碍以体育管窥中国整体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研究愿景,而这根本归因于当下体育人类学更注重共时性的功能阐释,对于史学的历时性缺乏关照所致,这也为未来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提供新的学科想象空间。最后,在研究视角与思路上,多聚焦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体育现象的描述,而以中西古今互证的视角,对体育如何表征社会文化的动态结构过程及历史意义还需推进;在方法思路上,多聚焦文化人类学的体育经验性阐释,不仅存在参与式田野工作与口述史研究方法混淆的现象,而且将人类学的参与式田野方法与史学的四重证据法未形成有机互补,缺乏释今寻古的历史经验总结及方法思路的延展。

王铭铭^[11]提出对人类学的历史化命题,认为人类学之所以涉猎历史,归因于“现代历史是短暂的,现代历史感是有问题的”。赵世瑜^[12]则在萧凤霞与刘志伟的结构过程概念基础上,提出“逆推顺述”的历史人类学方法论,认为逆推顺述是将田野调查获取的结构经验材料推至历史起点,再以此深描当下的生活,最终概括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与之史学的人类学化不同的是,张小军^[13]则坚持人类学本位思路,提出历史走入人类学研究,实现透过民族志文本寻求大理论延展的方法论转向。在对中国体育的研究基础上,胡小明^[14]提出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构想以探索身体运动行为与自然、社会历史相关联的整体性研究。戴国斌^[15]提出武术人类学需要民族志文本基础上兼顾“思绪千载,视通万里”的史学思路延展,以此强化对武术文化的整体性理解。以上研究为体育人类学的方法论转向提供思路与启示。基于以上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主要是指以史学的视角推进体育人类学的方法论创新,既要注重共时性阐释,也要强化历时性分析,根植于人类体育行为意义的跨时空延展,即以史学视角展开人类身体运动行为问题的探索。

鉴于此,在体育人类学尚未学科化的基础上,通过对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问题的追问,以此回答中国体育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呈现,试图从中国体育这一微观切口探寻东方体育文明形态的问题。从而在“何谓中国式体育”的新回答中修正已有论域乃至田野方法论,在实践表达与学理省思维度深化体育文化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既关乎体育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创建与成效,也有助于研究者方法论规范的养成,更拓展了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视野,以此为学术自觉之根基,进而形成“经世致用”的本土化学科体系。

2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逻辑

2.1 学科概念的异同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其目的并非将体育人类学转向史学研究,而是以体育文化实践的历史纵横发展管窥人类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而这一目的求索需要对体育人类学及史学的概念演进予以辨别与反思,以学科概念的异同发掘学科方法与范式是否存在交叉融合的可能性。

首先,对于体育人类学概念的反思,需以人类学的概念反思为起点,主要呈现为三重演进逻辑。其一,以“人”的研究为逻辑基点。作为人类与文化交融的学科,与表达人类精神世界的人文学科的异同如何表征?其二,以“社会文化史”研究为逻辑联结。作为

兼具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学问,其与史学的文化转向有何关联与差异,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在目标和操作层面存在何种区别与联系,形成兼具人类学色彩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其三,以“人类性”研究为逻辑指向。正如王铭铭^[16]强调构建“文明、生活、宇宙观”的人类学研究,在此也需反思其与哲学的“成人”性有何差异,在面对文明与文化,变迁与延续,理论与经验、普遍与特殊、外在性与内在性等矛盾时,其为文化学、社会学将提供何种思想,将如何处理“外来与内在的历史及世界智慧”的关系^[17],进而找寻人类文化的根基问题。

其次,对于“何谓史学”概念反思与解答。依据其研究范式呈现双重学术演进脉络。其一,以传世文献“正典化”为肇始,该阶段主要秉持静态结构史观,采用“大历史”叙事方法,叙述过去的人、物、事的起源及意义,但面对人类文明的动态演化进程,对于过去乃至当下人、物、事的意义的过程性呈现值得深思,与档案学、考古学又将如何区分值得反思。其二,以阐释地方性知识为目的。其根本在于将源自民众生活的“小历史”事件重返“大历史”的语境,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语境解答“小历史”事件发生的动态结构变化过程,即“以现实追溯历史及社会事实,从而反观现实,而成为传统地方文化历史的现代还原”^[18],继而通过前人的生活经验转至对当下生活意义的关照,与之格尔茨对文化意义的多层次阐释又将产生何种共鸣值得深究。

最后,在人类学与史学的概念反思基础上,体育人类学与史学表现出“由异而同”的学科取向,并在二者概念体系间的内在机理中予以体现。一方面,规约体育人类学不可仅从身体行为解答体育是什么的问题,还应回归其发生的历史场景,辨析生成的历史脉络,以身体运动行为的历史动态结构过程,实现对于整个社会结构过程变化的重新认知;另一方面,在史学概念笼罩下,呈现人类身体运动行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对当下人及所处社会意义的阐释与还原。首先以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身体运动行为经验,帮助理解史料,透视历史情境下人的身体文化活动及社会结构的动态过程,再以逆向工程思路寻其逻辑起点,既从人的体育生活世界出发,进行有意识的表达组织史料,又从体育的表象与符号进行集体无意识研究,建构鲜明特色的中国自主体育人类学概念体系,进而形成对不同时空“人”的不同理解。

2.2 学科方法的弥合

在对其概念反思的基础上,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首先体现在方法互补性上,即二者田野调查、

体育民族志等方法学的弥合层面,不仅要关注体育人类学的共时性分析,还要注重历史学的结构过程考察,既要实现文献史料与田野资料的“古今互证”,还要以普遍性与地方性的“中西互证”中追寻体育人类学的本土化特色。

一方面,集中于“古今互证”的田野调查操作层面。其一,运用考古文献,古籍文献、田野现场3个维度展开论证,将文献置于体育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中,从而让历史走进现场,实现历史场景与现实体育生活实践相互关照的目的。正如张士闪^[19]所言:“在田野中遭遇的一切既是现实也是历史,是可以展开绵密而深邃的思考。”其二,通过体育民族志文本撰写,践行由“文化生命解释”对“体育成人实践”的回答,以此回应人“由生到死”不同阶段的成长与变化^[20]。可见,民族志方法呈现出历史特性。其三,通过身体运动行为的历史动态结构过程变化,实现对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体育历史动态演化的经验性解读,映射当下人类生活世界的目的。为此,体育人类学研究,要将田野调查所看、所思、所想的身体文化实践延展至对人类行为文化的省思,突破对体育身体技术的描述,实现格尔茨的“深描”意境,进而对体育背后文化意义的解读与阐释。据此对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论需要做出以下调整:一是在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伦理性为前提,在征得被调查者同意下,借助史学的口述方法获取平民大众对于体育的认知,尽可能收集与体育事件关联的神话故事、史实与事实材料、口述观点材料,找寻体育文化与民众体育观念、情感、社会结构过程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体育发生的“历史事实”背后体察“社会事实”的目的;二是由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变,融入体育文化持有者的生活,通过亲身观看、体验、记录体育文化的历史感,体悟体育行为的意义,进而在与被调查者共情中获取事实性材料实现理论迭代。

另一方面,落实“中西互证”民族志文本呈现方式。既要秉持中国文化史方法论为指向,将体育置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中国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深描”^[21],进而析出体育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在社会情境与主体经验相统一中解释体育文化意义,也要秉持西方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将体育置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人类文明演化进程中予以阐释,以此深化体育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性思考。简而言之,通过民众的体育实践管窥文化中国与国之大事的内在关联性,形成体育人类学的整体性思维。但其核心要义关键是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建立坐标,注重在文化中国中展开体育人类学研究,进而形成体育人类学的史

学视野转换。同时,聚焦体育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关系的方法思路,从中国武术文化实践的文武分途出发,探讨当下武术历史根源及练以成人的教育文化实践^[21],这也构成探究“中国式体育”的必由之路。

总而言之,当前体育人类学与史学研究在方法上存在天然的互补性。从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研究体育一般规律,以及在理论上表现的具体形式构成体育人类学的方法论指向,但如何拓展其学术视野,继而观察、反思、深描当下平民生活,新史学关注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史、生命史等方法为其提供方法论的启示,有助于补充现有体育人类学的方法学上脱离历史感的缺陷,规避陷入就体育而体育的碎片化的窠巢之中。需秉持“生活处处是田野”的方法反思,实现现实与历史对话的可能,其归因于现实问题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层累而形成。因此,在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实践中,既要传统田野方法从3个月延长至1年以上,也要强调研究者融入调查对象的生活情境,理解当下人的生活;并于短暂的历史动态变化过程中,观察与体悟人类体育行为与历史文化情境的关联性,通过解构历史的方式理解体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及意义,进而实现“古今中西”的多重印证。

2.3 学科范式的联结

范式包含研究假设、范畴、对象及问题等内容,而新旧范式的转换关乎科学革命发生之关键^[23]。由此观之,体育人类学的史学转向,前提需建立在体育人类学与史学研究范式的统一之上,并于地方性体育文化知识的深描中,厘清民族志范式与当下史学范式间的内在关系^[13]。即体育人类学的范式与史学范式融合中推进范式迭代,而形成新的体育学科话语体系。

首先,史学范式为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提供历史性依据。从人类学形成之初主要源于殖民历史来看,深刻表明历史视角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当前体育人类学采用的体育个案的田野考察,构筑的体育民族志文本,多聚焦体育参与者的生产生活等现实经验问题,而对平民体育生活史的“深描”与不同历史时段体育的社会文化结构问题的追问鲜有论及,更难企及以体育回应历史的雄心。其归因于体育民族志对文化意义的多层次阐释相对薄弱,难以呈现总体性社会事实。对此有学者解答:“中国作为文明的大社会,不能只靠传统的人类学方法,要有历史维度,探索更大社会的人类学方法。”^[24]而作为史学重要范式的生活史、文化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族志方法上的缺陷,这也为体育人类研究拓展新的视角,在体育经验当中则表现为通过前人的体育生活化体验转至对当下人生活

意义的关照。

其次,史学的历时性与人类学共时性分析范式融合,为体育人类学拓展新的理论范式。既秉持历时性分析范式理解体育不同历史时段下的历史事实,以“走进历史的现场”^[25]洞察体育所关联的历史文化语境,强化体育人类学的历史观念;也遵循当下田野实践的共时性分析范式,观古今之变,深描当下体育参与群体的身体文化行为。长久以来,体育人类学受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体育所处的历史情境。然而,文化史研究范式则拓展体育的时间性维度,对民间体育参与个体或群体的日常生活史及生命历程进行阐释,可见,史学在历时性与人类学的共时性在研究范畴上形成高度的弥合性。

最后,二者范式迭代引领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新走向。近代以来,孙本文^[26]便提出:“注重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固有文化,因此必须对中国历史给予全般的研究,同时关注当前社会现实需要。”在体育人类学领域,便表现为将体育个案置于特定的动态社会结构中研究,透过体育以管窥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范式为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提供无限想象空间。

3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反思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反思,关键在于解答史学对体育人类学方法论创新与变革有何意义。当前,众多学者聚焦民族体育的人类学化构建体育民族志作为主要的方法手段,但就方法论自觉上,不少研究却存在将体育口述史与田野调查工作简化为同一范式,而忽略体育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时间纵深性分析。对此,有学者认为体育人类学有别于其他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关键在于体育文化异同的研究指向,其根本归因于历史差异所致^[27]。这也为中国式体育勾连社会动态变迁提供新的视野与思路。进一步看,体育蕴含的历史观念、生活智慧,乃至以文化人的目的性,决定了体育人类学研究史学转向的学理反思,既要强调以人类体育生活实践为出发点,亦要强化在历史关怀中对其研究予以修正反思。

3.1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延展

主体与客体相结合为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提供新的反思空间。有学者将主客相结合的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28],主体强调以报道人的内部视角理解研究对象,客体则是以研究者的外部视角理解研究对象,构成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核心在于将体育参与者作为历史主体,将人的体育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基点,而非国家或集体行动者作

为历史主体,以此勾连体育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加深对人类体育行为意义的深描。

当前,体育人类学研究既强调以主体视角对文化持有者内部的分析阐释,也要注重客体视角对于文化持有者的认知与理解。一方面,采取主体视角将身心会意作为原则,将“自己”作为方法^[29],不仅反思体育映射的人与人如何相处之道,而且需要研究者以将心比心的方式与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共同参与体育活动,重视自我身体经验与自我叙事、体悟调查对象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情感表达,从而实现主体间的共情,进而实现对于他者体育运动行为的再理解与再解释。另一方面,主张以客位视角对研究对象加以识别与区分,以古今互释观点审视访谈资料,实现历史文献与田野经验资料的互证,不仅将研究者“自己”置于体育发生的现实场景中,感知与体验文化持有者的当下体育生活,而且要以研究者的视角考量历史的复杂性,将中国体育现实经验转化至中国文明史叙述框架之中,管窥人类文明进程中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关怀。可见,体育人类学研究需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创造身体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对话,以主客结合的方法和视角展开研究。

3.2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拓展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反思性问题难以剥离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其特殊性体现在研究视野的差异,体育人类学强调人的当下身体文化实践,而史学更注重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分析。然而,如何通过体育个案之表象透视其深层的历史文脉,将有利于增强体育人类学研究深度,继而考察体育参与群体社会互动的内部机理与外部联系。一是追寻体育文化现象背后负载的深层文化秩序,以反思将地方性体育标识与中国历史相关联的目的,使之地方性体育标识成为地方史的重要见证;二是体育的发展并非断裂,而是基于具体阐述体育经验的历史情境,以体育史实反观人类的历史动态变化进程,诠释体育的历史想象,透过体育现象探求总体性的社会事实与历史文脉,最终,呈现人、事、物在历史过程中的内在关联性,进而阐述体育所蕴含的深层关系及意义网络。

回归体育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当中,体育文化实践往往与之所处的社会-历史序列相关联。对此有学者以微观个案表象为突破口,通过对身体文化意义阐释与还原,挖掘体育文化现象蕴含的深层文化机理,不仅将身体活动与之原生文化取得关联,而且以此深化对身体运动文化传承、嬗变乃至转换性生成的机理深描^[30]。映射出以体育认知民族文化特质的史学视野转换。进一步看,从体育经验视角关注特定的社会-历

史序列的变动,进入历史的结构过程(回到体育发生的历史情境下)发现历史语境下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照中体悟体育的变与不变,继而发现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文化传统的结构性关联及差异,进而以微观体育映射与之关联的深层文化机理,最终导向以不同文明进程中人的生存发展状态为目的。简而言之,将体育置于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小地方与大世界的方法论中予以考量,拓展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视野。

3.3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当前,人类学研究中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脱离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体育人类学的发展,而这关键在于摒弃单一的研究范式。具体表现3个维度:一是注重身体表达的社会空间维度,找寻特定时刻系统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二是关注体育文化行为的时间维度,突出体育系统发展的历史变化过程呈现;三是追寻体育空间结构生产历史过程呈现的动力及要素。对此,高丙中^[31]认为:“人类学的现在是过去记忆的映射。”然而,体育作为表征社会文化的身体竞技知识类型,何以在传统与现在关系中探明体育行为的动态结构性变化,以及如何以体育映射人类文明,时空结合提供范式变革上的解答。

以上的解答需要回归人类学与历史学家对于他者的认知与理解。对史学而言,主要体现在时间上的间隔;对人类学而言,则是体现在空间上的间隔与分布。体育人类学能否跨越时空距离,实现“通往他者的路”?在文化转型的人类共同问题上,反思人为何这样活,这样活有何意义,这样的生活为我们带来何种结果?在理论维度上,探索体育由传统而现代的生产机制,解读体育发展与当下境遇等问题,不仅需要理解体育文化现象的意义,而且需要还原体育发生的社会情境与动态时间呈现,且不能限于共时性的体育功能性分析。具体而言,其一,关注史学范式下体育相关文史资料解读历史进程中的精英人物、体育事项前后的因果逻辑;其二,关照人类学范式下田野实证与口述史料互证阐释民间个体、群体的日常生活世界,由此也决定了体育人类学的范式转换应关注时间与空间双重视角。落实在体育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之中,既注重对生活化体育的个案考察,也要将体育文化相关联的区域史料文献作为研究的重要部分,寻找历史时间起点,并以此作为研究逻辑基点,实现古今互释目的,从而实现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

3.4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寻绎

体育作为人类身体文化实践处于不断生成与变迁,往往需追溯历史的时间节点,作为现在的起点,

继而实现以历时性分析体育事象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共时性阐释体育事象在当下的功能性呈现。释今寻古强调对当下问题的历史追溯,强调从历史开始^[32],反思“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此加深对于现在的理解,从而加深对于社会本相新知的体认与体悟,这无疑构成体育人类学的历史叙事方式,也构成观察体育要素历史变化过程的方法论。由此,杨海晨^[33]认为对于当下身体运动行为的研究,找寻历史事实背后隐喻的社会事实的观点,其对演武活动的文化生成文化机理挖掘,便回归至中央王朝推行的土司制度、土司生存等历史过程寻求答案,进而找寻对当前体育行为意义的解答,以此形成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经验。

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人类学研究中,传统体育在动态历史变化进程中而变化,既映射过去生活方式,也无法脱离现在对于传统体育的解释,正如霍布斯鲍姆^[34]所言:“传统是现在的发明。”然而,中国传统体育是伴随中国社会文明历史发展进程而发生^[35],这就要求回归体育发生的历史现场,感受作为地方性文化知识与符号象征体系的体育,找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事、物的历史关联性,寻求当下体育问题的历史起点,然后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由远及近阐述结构要素的复杂历史过程,从而深描当下的生活世界。正如戴国斌^[15]提出的武术人类学研究既秉持思绪千载的历史视野与视通万里的空间维度,在历史与现实田野耕耘中,尽可能还原至武术产生与变化的历史情境中,重释武术练养、攻防、师徒等要素动态变化过程,不仅关注武术文化古今之变,也要历时性深描当下武术人的生活,加深对武术文化实践的理解。最终,以历史层累的方式下形成释今寻古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进而在体育的过程性变化中,以过去的“我”反观现在的“我”,找寻体育结构要素复杂的动态社会结构过程。

在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强国的叙事逻辑下,体育人类学研究需要方法论上寻求理论突破。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既需要强化共时性的文化深描,展开多层次身体运动行为意义的阐释,也需要强化历史观念,以古今互证的思路,历时性深描当下生活,形成历史与现实、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此,需从时间与空间维度探寻体育人类学“何为”与“为何”的问题,否则难以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形成体育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试图进行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实现由空间平面分析到时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转向,据此阐发人与体育所处社会文化结构的历史关联,及阐释体育的历史动态变化过程及运行机制,继而展开对不同时空体育文化意义的

阐释与还原。以此为学术自觉,试图从人类学与史学的视角诠释身体运动行为表达,继而回答何谓“中国式体育”的新使命。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涉及历史人类学视角,但主要是秉持人类学本位的思想,探讨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问题,未触及体育史的人类学化的命题。鉴于此,能否以体育史为切入点,以人类学的方法论为指引分析与阐释体育史议题,需要学者进一步深思。

参考文献:

- [1] 渠敬东.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J]. 社会, 2019, 39(1):1-36.
- [2] 王铭铭. 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2.
- [3] 克里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523.
- [4] RAYMOND F. A dart match in Tikopia: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primitive sport[J]. Oceania, 1930, 1(1): 64-96.
- [5] 倪依克,胡小明. 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述评[J]. 体育科学, 2009, 29(10): 65-71.
- [6] 胡小明. 体育人类学[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7] 谭广鑫. 原始武舞与巫术交融的武术萌芽状态[J]. 体育科学, 2019, 39(4): 81-89.
- [8] 郑国华,丁世勇.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失范的成因——以富禄村、平安村为例[J]. 体育学刊, 2008, 15(12): 92-95.
- [9] 和春云,倪依克,葛锦润,等. 原始宗教舞蹈象征意义的身体表达——纳西族阮可东巴舞蹈身体动作文化符号解构与重构[J]. 体育学刊, 2019, 26(5): 35-43.
- [10]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M]. 谢维扬,俞宣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22.
- [11] 王铭铭. 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J]. 西北民族研究, 2007(2): 78-95.
- [12] 赵世瑜. 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3(1): 1-11+193.
- [13] 张小军. 当历史走进人类学家——评萧凤霞《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3(1): 12-21+193.
- [14] 胡小明. 体育人类学方法论[J]. 体育科学, 2013, 33(11): 3-16.
- [15] 戴国斌. 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若干思考[J]. 民俗研

- 究, 2020(5): 133-138+160.
- [16] 王铭铭. 人类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
- [17] 王铭铭. 从经典到教条: 理解摩尔根《古代社会》[M]. 上海: 三联书店, 2020: 38.
- [18] 张亚辉. 历史与神圣性: 历史人类学散论集[G]//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22.
- [19] 张士闪. 礼与俗: 在田野中理解中国[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9: 9.
- [20] 王建民.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J]. 民俗研究, 2014(4): 30-36.
- [21] 花家涛, 戴国斌. 彝族村寨火把节“火-祖-捧”的文化解读[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7(1): 67-70.
- [22] 戴国斌, 刘祖辉, 周延. “锻炼行道, 练以成人”: 中国求道传统的武术文化实践[J]. 体育科学, 2020, 40(2): 24-31.
- [23]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53-54.
- [24] FREEDMAN M.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ology[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3, 14(1): 1-19.
- [25] 桑兵.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1): 191-204+209.
- [26] 孙本文. 建设本位文化的标准[C]//马芳若. 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 上海: 经纬书局, 1935: 58-59.
- [27] 谭广鑫. 苏珊眼中的体育人类学——美国学者苏珊教授访谈录[J]. 体育学刊, 2019, 26(2): 1-5.
- [28] 卢卫红. 人类学“主位-客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 29(3): 69-73.
- [29] 赵旭东. 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186(6): 138-150.
- [30] 孙德朝. 理论融通与方法叠加: 羌族原生态“莎朗舞”文化现象存在社会意义阐释[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12): 138-152.
- [31] 高丙中, 郭金华, 龚浩群.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版)[J]. 西北民族研究, 2020(2): 151-165.
- [32] 费孝通.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J]. 文艺研究, 1999(3): 28-34.
- [33] 杨海晨, 王斌. 从工具到传统: 红水河流域“演武活动”的历史人类学考察[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10): 14-22+36.
- [34] E·霍布斯鲍姆, T·兰格. 传统的发明[M]. 钱杭, 顾冠群,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5.
- [35] 刘秉果. 中国体育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5.

